

平谷文史选辑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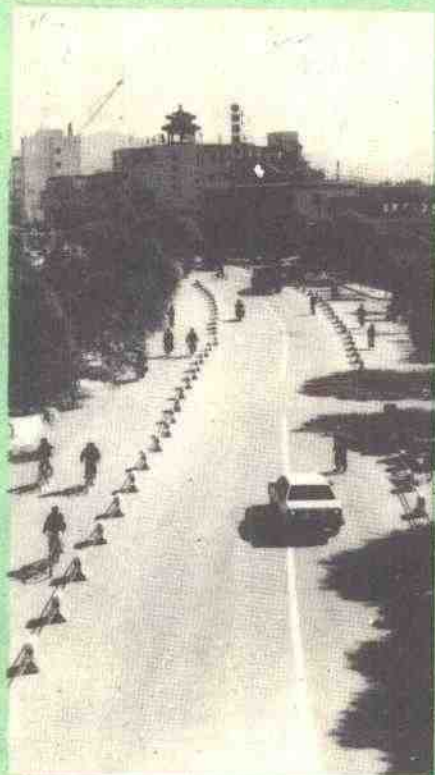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平谷县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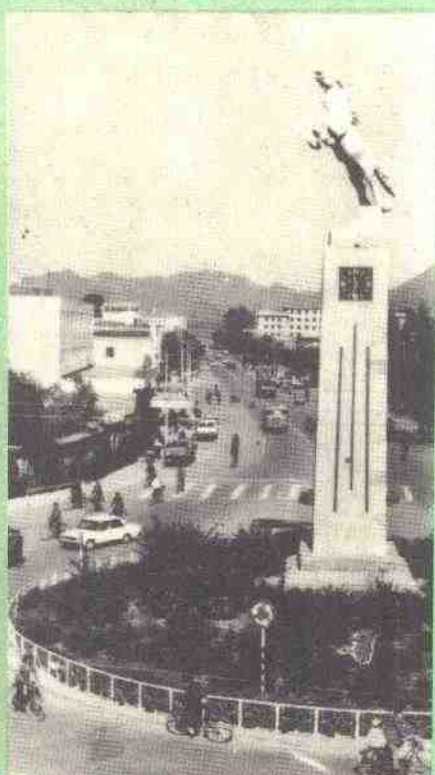
平谷文史选辑

(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平谷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月



平谷旧城新颜



新平东路北眺



绿荫掩映的街市



美丽的府前西街



亚运圣火到平城



街心一隅



幽静典雅的人民公园一角



金海湖水上运动场



平谷大路宽阔

前 言

《平谷文史选辑》第一辑问世后，得到诸多老同志的赞许和各届人士、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团结奋进的形势下，承前辈和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各方朋友的支持鼓励，我们又编二辑。

本辑设老同志革命回忆、抗战史料、统战人物、行业春秋、地方风物等栏，选载资料二十一篇，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下，力求从多角度再现历史，集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为读者提供一个洞察历史的窗口，思想教育的园地。然因水平所限，只恐难负众望，切望前辈指教，同仁相助，读者批评。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刘向道、王雪松、王国士、李兰芬等许多革命老同志不顾年迈，尽力撰稿；政协主席王秀峰，副主席路晓龙、高继孟等领导不避辛劳，细心审订。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北京市平谷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1990年10月

目 录

我寻求革命道路的经历	刘向道(1)
复仇的火焰	
——随六区队转战记	金 有(42)
平谷妇女工作散记	李兰芬(64)
战地生活记趣	王雪松(86)
抗战教学的片断回忆	吴郁周(100)
抗日堡垒铁北寨	胡永连(109)
夏各庄的对敌斗争 ... 张占宜	王 谦(125)
儿童团，我们革命的摇篮	任宝魁(140)
我难忘的抗日堡垒户	
——致花峪村李树棠同志全家	
.....	王国士(148)
王家坟伏击战	袁沛增(153)
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	岳永同(155)
日本鬼子烧毁了水峪寺	陈洪义(159)
从“绿林好汉”到人民卫士	文 始(164)
纪念爱国人士蔡兴斋	江 东(182)

记平谷的第一个农民合作社	··· 王福成(199)
平谷商会始末	····· 王福成(208)
一个照像师的回忆	····· 郝式利(215)
弦板声声话今昔	····· 蔡连元(226)
平谷新城赞	····· 韩维泉(238)
忆家乡的民间花会	····· 纪振明(250)
丫髻山	····· 纪振明(260)

我寻求革命道路的经历

刘向道

编者按：刘向道同志是平谷县峪口村人，1908年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青年时代就积极追求革命，历尽艰辛，曾参加过穷人会的斗争和“通州事变”抗敌。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中，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蓟、平、三、顺、密五县抗日游击总队，暴动失败后，率残部上盘山，在我党领导下，成立了盘山抗日游击队独立大队，任参谋长兼二营营长。1940年初，他率武工队深入平谷以南、三河以北开辟地区，又任蓟平密联合县三河特别区区长。他英勇善战，神出鬼没，使敌闻风丧胆。1943年，刘向道同志任平三蓟联合县委社会部长兼县公安科长，1945年调任冀东十四地委社会部长兼地区公安局长，1948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兼教导师政委。建国后，他先后在67军生产部、华北建设包头总公司、中建部及辽宁省建委任职。刘向道同志的革命生涯与平谷县乃至冀东西部地区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充满着爱国

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的回忆录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必然对后人有所教益。我们将陆续整理刊载，以惠读者。

当学徒忍辱负重 投奉军背井离乡

我的家乡是平谷县峪口村。1908年我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父亲名叫刘维馨，号德吾，行伍出身，是张勋的“辫子兵”里的小哨官。我幼时父亲便离家出走，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我母亲的娘家是平谷县南独乐河村，外公崔如刚是清末拔贡，虽未及第，却是平谷县颇有名气的文人，号称“四大怪”之一。出身书香之家的母亲对我影响深远。她的善良、勤劳、正直的品格对我潜移默化，她的“为人要多行善事，见义勇为”、“穷不发不义之财，富不吃喝嫖赌”的谆谆教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还有三个姑娘。由于家中没有土地，没有劳力，没有经济来源，身患严重胃病的母亲为了拉扯我们姐弟四人生活，只得打卖房产的主意了。分家时，我们分得五间房。卖掉之后，我们租了三间土房住下。母亲将卖房所得的钱精打细算地花用，几年中，将姐姐们先后打发出嫁。最后，到母亲身无分文的时候，只能靠给人家

做针线勉强维持生活了。

尽管家境清贫，母亲仍不忘让我求学。我八岁念书，时逢民国初年“教育大改良”，废私塾，开新学，采用新式国文、算术课本，并有体操，学生不准留辫子，要剃光头。当时峪口只有一个大型私塾馆，便将它改成了学堂，叫做“蒙养学堂”。然而这学堂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原来的教书先生杨某充当教员，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学究不肯彻底剪掉辫子，便留了个“刷子”。课堂上明里摆着国文、算术课本，教的仍然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之类。初一、十五日，仍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母亲的思想比较开通，叫我帅先剃了光头，却不料给我招至了不幸。我不仅成为同学们歧视的对象，更成为杨老先生的眼中钉，加上我家境贫寒，请不起老师的吃喝，在学堂里经常是犯小错，受重罚，精神压力很大。在这个不伦不类的“学堂”里混混沌沌地念了五年书，母亲也感到于我的学业无利，便又托娘家帮忙，将我转往南独乐河村上书馆，寄宿舅舅家求学。书馆的老师叫陈启基，六十多岁，教了一辈子书，老两口度日，家境很穷，经村里众人攒凑个书馆，收十几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年交几斗粮算是学费。我与这老师沾点亲，学费也就免了。陈老师收入微薄，苦不堪言，教书也是强打精神。他在

课堂上摇头晃脑地自嘲道：“过了一天又一天，天天吃饭也为难；若问工钱得多少？一日不足二百钱。”不久，他便弃馆而走，到兴隆找他种山坡地的女儿去了。我补读了二年半书，又失了学。

我再也没有条件读书了，贫病交加的母亲只得给我找一个能够吃饱饭的地方。经过多方托求，一位远房舅舅为我介绍了一个当学徒的差事。这时，我十五岁。母亲含泪为我打点了行装。她将家中仅有的一床破被，一条旧褥子，一片毡子都给了我。我学徒的地方是个酒粮店，活儿很重。由于我们和掌柜的也沾亲，他是舅辈，所以尽管我年小体弱，使用上却毫不客气。我终年劳作，起早贪黑地干，一年只得二十吊小铜钱。这个店里有一个小少东家，年岁与我相仿，经常来店里玩。有一天，他竟然要我当马给他骑，我不干，他便骂我，说我这个“奴才”不听使唤。我气急了，和他打起来。我的手被他咬伤。正巧掌柜的也到后院来，他不容分说，又是扇嘴巴，又是拳打脚踢，还破口大骂，说我的命还不如他家的一条狗值钱！我从这拳脚和恶骂中尝到了人间的不平。为什么都是一般大的孩子我就应当被人欺辱，被人打骂？为什么人的命还有贵贱之分？难道我一辈子就再也改变不了这个“贱命”了吗？

就在第二年，家乡有人捎信来，说母亲病重，

要我从速回家。待我赶回家中时，母亲已是奄奄一息了，无论我怎么呼喊她，她也不能答应我们。原来，家中早已是无柴无米，无医无药，也无人伺候母亲，直到前一两天姐姐们闻讯赶来时才请到医生，可医生只摇摇头说：“不行了，不必再用药了。”就在这天夜里，母亲与世长辞了。我们悲痛欲绝。次日，靠近族们攒凑了个白碴薄皮棺木，算是安葬了她老人家。可怜的母亲孤苦一生，贫病一生，她所留给我的只有一个小白木柜子和几件不像样子的旧衣破被，还有一个缺一条腿的小饭桌和几个破边的盘碗，一个半截的水缸，一个小铁锅。

母亲死后，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孩子。左思右想，别无它途，还得回铺子里去干那挨累受气的差事，混口饭吃。这年我十七岁了，可身体还是瘦弱，掌柜的嫌我顶不了大事，就把我打发到另一个烧锅上干学徒。这一家活更累，不但白天忙个不停，夜里伙计们还得轮班为他家守夜打更。担惊受怕，吃苦挨累地熬下来，头一年只给我三十吊钱，第二年给五十吊，第三年七十吊。这时，我已是十九岁的青年，渐渐明白了事理，知道如此偷生，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何况当时军阀混战，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我们这个烧锅也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我忽然产生了想要当兵的念头。虽说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当兵吃粮，走南闯北，

也许能闯出一条生路。决心一下，我就跑到驻在镇子上的奉军里补了个兵。这军队的番号是东北陆军骑兵第六旅，驻当地的是该旅的军需处。我毕竟是读过七年书的人，在军队里好混，不久就把我调到军士连里受训了三个月，再回到军需处当了一名贴写，随即便提为中士。这是1926年秋，部队开到河南北部，听说前方已有两广出师的北伐革命军交火。次年奉军战败，我们退至山海关驻防。1929年冬天，部队又调往黑龙江省海拉尔一线“防俄”。

近苏俄闻听革命 觅红党踏破铁鞋

北国边陲重镇海拉尔与已经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相接。我来到这里后，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这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初到海拉尔，到处都可以见到俄国男女。我疑惑不解：中国人要“防俄”，可这里为什么又住着这么多的俄国人呢？后来听说，这些俄国人全是“白俄”，他们是在俄国革命中被“红党”赶出来的流亡者。那么什么叫做“革命”？“红党”又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那时，我们接触老百姓很方便，我便不断地向老百姓打听关于俄国革命和红党的事。我终于知道了：红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俄国老百姓

推翻了当官的，打倒了财主，这就叫革命；革命后的俄国叫苏联，讲平等，由穷人当家做主，人人有工作，大家有饭吃……这真是一个令我神往的地方！我尤其钦佩共产党。因为我听说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穷人人这个党，又专为穷人办事，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好、最公道、最应当受我拥护的党吗？

这时，正值中外瞩目的中东路事件发生，满州里、黑河一带中苏交了火，黑龙江边防军梁忠甲、韩光第两个旅全军覆没，紧接着几十架苏机对海拉尔、伯克图、雅克什的火车站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奉军“防俄”部队全线溃退，中东路之争以中方彻底失败告终，我们骑兵旅回奉天省彰武县驻防。这已是1930年了。

从此以后，我像着了迷似地琢磨着苏联发生的事，天天想红党，盼红党。不久，便听说中国也出了共产党，张大帅在北京杀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名字叫李大钊，他就是共产党的头目。我明白了，在中国，共产党是秘密的，当共产党是要杀头坐班房的。但我还是不断地探听共产党的消息。

有一天，我们这里新补了个贴写兵，他是断民县人，中学生，姓张，我俩不久便熟识起来，相处得很近乎。他知道的事情比我多。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秘密组织，并说在南方还有共产党的军队，叫红军。我听到这消息后，马

上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念头——到南方，找红军。

真是说干就干。我以请假为名，离开了军队，搭火车到北平，住在北城的一个小店里。可一住十多天，路费花一个少一个，下一步棋却不知怎么走了。光知道红军在南方，这南方可大了，没目标地乱撞岂不是大海里摸针吗？再说，一旦路费用光，就寸步难行了。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一天忽然在宣武门看到一张“首都警察厅”招收警干训练生的广告，共招新生 120 人，经考试合格便能录取到南京受训。这真是一个南下的好时机。我立即报了名，经体检、作文、口试合格，三日后乘火车到南京，受训三个月，分配到警察二局当了守卫。此时已是 1931 年 4 月。我虽身着警服，站岗值勤，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处处留意打听红军的消息。可试探多次，没人敢说共产党的事；国民党的报纸更是封锁严密，只字不提红军。我只好耐心等待时机，同时积蓄路费。哪知道天天盼、月月盼，我盼来盼去，盼到的竟是“九·一八”日本占领我东三省的噩耗。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我心中也燃起了救国抗敌的烈火。我想：我是军人出身，国家危难，正是我报国献身之时。我于是暂时打消了找红军的念头，只要中央政府下令出兵抗日，我就再度从戎，随军北上。可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一点抗战的